

新文化运动与浙江一师风潮

桑兵

【提要】：1920年因为更换校长经亨颐触发的浙江第一师范风潮，是继五四爱国运动而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少有酿成冲突的重要事件。学生一开始就自我定位为维护教育革新和巩固文化运动，而具体指陈的四项教育革新内容，学科制议而未行，教师专任、改授国语已经民国政府教育部下令实行，学生自治则与美式自动教育的兴起合拍。而且这些举措均提倡已久，并非新文化运动才出现的新潮流。仅就浙江一师而论，只能说经亨颐刚好踩到了新文化的点上。不过，经亨颐还长期担任浙江教育会会长，其推行新文化运动的机关其实是教育会，他希望通过改造学生的人格向社会传播普及文化，进行社会改造。因此，浙江全省乃至全国学界都将一师学生的行动视为捍卫文化运动之举，予以支持。发起新文化运动的上海国民党人对一师风潮推波助澜，而同为发起人的江苏教育会，由

于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与经亨颐的人格教育暗中角力，未能伸出援手。

【关键词】：浙江一师；经亨颐；教育革新；文化运动

DOI:10.16235/j.cnki.33-1005/c.2023.05.026

在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论述中，浙江一师风潮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在时间顺序上算是把握得最为近真。尤其是由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和中共杭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共同编辑的《浙江一师风潮》一书中，编者的“编辑说明”以及沈自强执笔的综述，都清晰说明风潮是五四运动之后，为巩固和发展新文化运动成果而发生。从五四运动前的新思潮，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浙江一师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①

尽管如此，由于整体上错判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时序，具体论述时仍然难免混淆，以至于忽略风潮历史地位的一些关键要素。《浙江一师风潮》第六部分收录的三篇论文，有些地方就不免受整体观念的影响，导致认识与事实若即若离。此外，还有一些近现代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般性问题，例如集中一点不及其余，只看事件的直接资料，忽略其他相关因素，时间上主要事件的来龙去脉，空间上各种问题的彼此关联，尚有不少可以深入探究和解读的空间余地。在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联系及分别复归时空本位的前提下，着重从新文化运动的视角重新审视浙江一师风潮，不仅能够详人所略，而且可以更进一步。

一、教育革新

浙江一师风潮，缘起于浙江教育厅撤换校长经亨颐，学生则全体挽留“主持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经校长，^①双方针锋相对，严重冲突，以致酿成震惊全国的大风潮。此事的关键，一是经亨颐其人，二是经校长所做之事。

民初实行大学预科制，浙江高等学堂因而停办。^②虽然还有之江大学，但是教会学校，不在民国政府认可的学制系统之内，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遂成为省内的最高学府。校长经亨颐是浙江上虞人，生于1877年，1903、1909年两度留学日本，先是毕业于弘文速成师范学校，后来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化学科。1908年5月本科一年级时，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开办，因为已经毕业的几位学长不愿就教务长一职，被留日同乡会公举回国承乏，向东京高师休学一年。后又回到东京高师，改入数学物理科，毕业回国后，再度被聘为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③民元以后，出任校长，后该校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亨颐继续担任校长，持续十年之久。^④

民初政坛波谲云诡，经亨颐极为不满。1917年阳历元旦，他觉得“社会上既无新年景象，校中亦不举行祝贺式。国家形式与社会实际、人民心理不相牟合，此为最著之一端。对学生不能作假意之训辞，故无仪式，以符诚字之校训。”并于全省学校职

员新年恳亲会致辞时，特意将政事风潮的乱象与教育团体的欢乐和好做一对比。⑤是年之江大学举行第50次毕业式，校长司徒雷登“先期函柬特约，希余必到，并致训话”。其演说大意为：“诸君在本国内受外国人之教育，若为他国便有过虑，惟美国与我国感情最好，余愿代表我国教育界特申谢忱！”对于毕业生，主要有两点希望：“一、我国现状，人材与事业之不适，当希后来青年有以矫正之——不图幸进，用其所学。二、我国取法美国之要点，以充足中等社会为要。美国立国之道在中等社会健全，中国亦应以中等社会为中坚。谨以三中字供诸君研究。”⑥

寄希望于青年，训练青年以改造社会，是经亨颐的一贯理念。1918年7月3日，他出席安定中学毕业式，致勉励辞，赞许东京自费生以安定毕业生为最多，向外发展之意志，殊为可嘉。“吾浙人近来萧率之气，甚至消极而思入山者，颇有其人。西湖之胜，误我浙人不少。中学毕业生之消磨、株守，虽有各原因，而少年老成、三思而行，实为根本之暮气。人生有进无退，得寸则寸。时事之刺激，戒我妄猛则可；因而隐避，实自杀也。”7月10日，赴校行终业式，“反省此一学年间，校务无所起色。细察学生心理，尚无自律精神，宜稍加干涉。示范训谕之功，固不易见，以空洞人格之尊，转为躐等放任之弊。漫倡佛说，流毒亦非无因。故特于训辞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学，嗣后宜禁绝此风，以图积极整顿。”⑦对于盛行一时的世界主义，经亨颐不以为然，认为国界不存，爱国心付之东流，所以“吾人唯一之大要义曰爱国”⑧。

1918年11月14日，教育厅通知为庆祝欧洲和平，放假三天，于星期六晚间，在平海路教育会开庆祝大会。15日，约定司徒雷登、梅藤更、伊藤斌夫三人演说，经亨颐亦其一。拟题《战后之协约》，大意谓：“战争者，非徒武力解决，实为文化发展之动机。战后之协约，非武力之协约，为文化之协约。国家已非军事之单位，本为文化发展之单位，别有用意，别有所协，别有所约。吾国人处此，不可不觉悟也！”16日晚最后演讲，“以别有所协、别有所约一语，刺激青年，似有力。”①

11月27日，教育厅通知再度举行庆祝活动。经亨颐主张学生组织临时通俗讲演团，使国民有所觉悟；否则，徒然热闹一场，何益之有！得到众人赞成。28日下午1时，“至平海路省教育会，集各校任演讲学生五十余人，先由余说明此次重行庆祝要旨及演题：《欧战之结局》《大中华之国运》《世界和平之幸福》《协约胜利之公理》《今后之中华国民》《青年团之预告》《卫生礼法与国民人格》《劝用国货》，由各校学生分别认定。分为露天讲演，每校一组；会内讲演，每校一人。颇有兴致。“亦足见吾国青年之可望也。”29日午饭后，各校学生露天演讲团先后出发。1时，教育会会所座满开会，到场听讲者，不下七八千人。湖滨一带，五六处露天演讲，每处听者亦甚多。直至晚9时后提灯会开始。②

浙江自辛亥光复以后，实行所谓浙人治浙，到1917年因政局变化而废止。原来的社会团体，鲜有起色，必须自固，教育会为最重要的精神团体，“宜如何使之有力，以辅助行政，监督官厅，非虚张声势，徒藉名义所可已。”经亨颐自1912年起担任教育会会长，竭尽全力加强会务，希望浙江“移政治之思想，作教育之精神”，“使吾浙之教育精神悉归纳于教育会”。③

浙江一师全体同学在发表第一次宣言时，就明确提出挽留经校长的两大理由，一是“维持本校改革精神”，二是“巩固吾浙文化基础”。因为“现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教育革新与文化运动两件事，浙江如果无份，浙江人就只能像蛮人一样，捧着“快寿终正寝”的固有文化生活。④关于前者，主要是指教育革新。浙江一师的教育革新发生于1919年的秋季开学之后，经过五四、六三两次运动，时代精神大大地改变了。为了迎接新的潮流和思想，经亨颐决心大力改革本校的组织、教授以及管理训练。主要内容有四项，即职员专任、学生自治、改授国语和改组学科制。前三项实行了一学期，后一项则决而未行。

四项改革之中，除了改授国语直接牵涉文化运动，其余三项，似乎都限于教育范围，其具体内容究竟如何，与文化运动怎样扯上关系，应该有所解释论述。而一师全体同学的宣言关于此节，并没有清晰说明，其第二项理由似乎只是第一项的简单引申。在后续的宣言和请愿书中，学生大概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因而逐渐清晰地解释说，教育的几种根本革新的措施就是为了尽宣传文化的责任。⑤

所谓职员专任，按照学生于1920年4月15日提出、校务会议5月13日通过的议案，其实就是“教员专任”⑥，规定教员专职聘任，不得校外兼差。在1919年11月25日与奉省长训令来校查问的教育厅特派科员富光年的谈话中，经亨颐声明，此事

教育部曾经催过好几次，本校屡次要想实行，意思是奉命行事，并非独创。因为中国学校的流弊，是校长专权，教员只对教课负责，不对学校负责，兼着好几处教课，更没有时间进行研究。一师实行专任制，教员须志愿和牺牲，在预算未增加的情况下，有些教员薪资减少，教课以外的职务反而增加，却能负责任。^⑦

两年后，经亨颐应《教育丛刊》编辑主任汪懋祖之邀，专文详论《教师专任问题》。他一方面批评中国社会里教师最自由最舒服，中等学校以上当教师没有一定之规，听铃声上课就行，有时还临时请假，不必扣薪水。预备一份讲义，同地方、同课程的学校可以通用，所以往往兼课几所学校。直到来华实地调查的孟禄博士指出这一缺点，才引起关注。只是现在中国实行教师专任，也有流弊。因为专任之于教师既是限制也是保障，所以往往有异而实同的争议，也有同而实异的赞成。校长倾向于限制，教师倾向于保障。其实二者兼而有之，互为因果，没有限制也就无法保障。根据浙江一师试行教师专任制的经验教训，经亨颐认为不可使教师心不安，但也不能心太安，所以调整为“有任期的专任制”^①。

试过才知的苦辣酸甜，当年经亨颐并无体验，他甚至认定教师专任是消除教育不能良性发展的关键，断言：“省垣各校不假此名义，永无整顿之希望，请其积极进行。”^②早在1915年9月，经亨颐代表全国师范校长会议起草答复教育部咨询第一案如何平衡国民人格教育与生活教育时，所拟办法就包括教员宜专任，因为教员不负责任为学校教育无训练的最大原因。“盖教员非专任，对于职务无稳确之观念，对于学校无专任之精神，欲言人格难矣哉。”^③1917年春，教员专任问题进入浙江教育界议程，经亨颐起着主导作用。2月10日，他在浙江教育会的校长会议上提议推行教员专任。2月26日，为教员专任问题开临时校长会议，“推余起草，固原动者。”3月1日，“拟专任教员试行法，先从理想约定为规则，然后与现聘教员事实相合，能否可免窒碍尚不可知。”3月3日，至教育会开临时校长会议，“余拟就专任教员试行法草案，与各校实际尚无大差。各校长希将草案印刷分送，与现在情形妥为凑合，须于星期三再开会方可决定。余将草案送报馆，使省垣外各校参考，以期易于统一。”3月10日，作函寄冯季铭，为专任教员事。“渠主张月俸厚于后而薄于先，余以为有流弊。偶有所见，不敢隐，亦我尽我心而已。”^④

此事未能落实，1919年初，教员专任再度提上议程。1月29日，“庚三（王锡镛）来，为接洽八年度预算事，准照专任编制，实行与否，责不在我也。”3月24日，“晤张萍青，谈本省教育经费，八年度共百十四万，较去年增加十万，而专任制犹未能实行，为之怅然。”3月26日，又至教育厅，“为商专任制事，因闻预算之关系，又将作罢。”^⑤可见这项革新，的确是由来已久的老问题，之所以一直议而不决，经费不易落实外，对于收效及反响难以把握也是重要原因。

1919年暑期，一师在经费仍未解决的情况下决心试行专任制。经亨颐记：7月6日，夏丐尊、王庚三来，接洽校务，大致已定试行专任制，添聘国文教员、理化教员，而夏、王则为校内中坚，少任教课。7月7日，上午，为校事访姜敬庐、范元兹、沈仲九，试行专任制有所商榷。午后，又邀夏丐尊、王庚三、朱听泉来谈。10日，拟专任职员规则数条。9月25日晚，集本校专任职员在寓便膳，接洽校务，说话甚多。11月3日，5时，开专任职员会议，“提出意见颇多。微有意见，彼此未彻底，杞人尚不少也。”^⑥事已至此，教员仍然意见不一。

实行学科制是教育革新的另一项举措，原来一师采用学年制，整齐划一，每学年学生只要有一门课考试成绩不及格，就要留级一年。连带其他及格的学科，也要重新学习，而且不能不到班。学科制旨在打破学年制，每学科分成若干学分，分年修了，达到一定单位，就算毕业。同时教学方面化繁为简，将原来的19门学科归并增删为8门，即教育、国语、数学、外语、理科、艺术、体育、公民。其余如教授时数、各科编级等，也相应进行调整。^⑦改用学科制的初衷是为了免除学力偏向、优生差差距拉大、年级界限等问题，但风潮发生时，尚未实行。

位列第二的学生自治，就教育原理而言，争议不大，可是一些人觉得不仅是学校管理，而且联系到解放的人生问题，以为学生还没有自治能力，校长职员完全不负责任，会导致大权丧失，学校革命。其实教育的目的就是养成自律，为此，有必要经过一段他律。如果在校期间完全他律，则自律无从谈起。经亨颐主张学生自治，是从毕业生说“出了学校门，换了一个人”有感而生的觉悟，学生毕业前后的问题完全两样，要将毕业后的问题提到之前来讨论，“非使学生自治不可”。所以学生自治不必由学生要求，而应由校长教员发起。经亨颐后来一度到北京高师担任总干事兼学生自治指导委员长，就是希望表现学生自治会

的真义，报答一般中等学生青年。^①

浙江一师学生组织自治会，在中国各师范学校中为最早的三校之一（其余为北京高师和南京高师）。经亨颐对此相当重视，与相关人士讨论会章，定于1919年11月16日召开成立会，还专门作自治歌：“不知人生，那知自治？自然淘汰误至斯！禽兽草木无理性，山川风月无意志；教育为何治何为？理性意志各自制。”并预备在自治成立会上发表演说。^②

学生的自治能力，只有通过自治才能养成，校长教员则负责指导。一师的学生自治大纲共9条：将学校事务分为学生自治与学校行政二部；学生自治由全体学生组织，学校行政由全体职教员、事务员组织；自治制度由学生自行议定，范围包括身体健康、研究学术、发表思想、涵养德性、衣食住、课外作业、社会服务、校内整洁、储蓄贩卖、课外出入、同学行为惩处劝诫及其他；学生行为不妨碍学校行政者，学校概不干涉，学生不得干涉学校行政，但得陈述公共意见，供学校参考；学校对学生自治的缺陷负劝导扶护之责，职教员及事务员另组织团体备学生顾问，学生自治团体可陈请代判其所不能解决之事。^③经亨颐说，学生自治实行为时不久，效果却十分显著，尤其是禁烟（包括旱烟和香烟）、膳厅（由学生经管）、请假等长期令校方头疼的问题，居然大为改善。^④不过，稍后经亨颐表示，对于该校的学生自治会并非完全满意，觉得和自己的宗旨相差太远，可以说是教师不负责任，听由学生以口而非胃为标准滥吃。^⑤

改授国语又称为国文教授，即原来以文言文为教材，现在改用白话文，教材选用报刊上的文章。一般认为，这是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迎合新思潮，实则经亨颐认为中国文学不改革，教育万万不能普及。1917年浙江就开过国文教授研究会，大家只知道国文应该怎样教，并没有研究国文做什么用。经亨颐经历几次新旧转换，最终认定“国文应当为教育所支配，不当国文支配教育”的宗旨，非提倡国语改文言为白话不可。以往批评师范毕业生，多是说国文程度不够。要在短短五年里养成进士翰林的文章，绝无可能，为普及教育，关键是可以写出思想。白话文风行，就是因为随随便便可以发表。“不讲是教育的绝境，讲错了纠正是教育的本务。”所以经亨颐认为，“提创白话以后，才可以讲教育，本校要讲教育，所以决定要改革国文教授。”^⑥他告诉学生，此刻我们学白话好比姑娘缠足，从前不是小足没人要，前几年提倡天足，如今反而小足没人要。早学白话文，犹如小足时代提倡天足，将来白话一定发达。至于白话与文言的雅俗，没有固定标准，全由各人主观决定。^⑦

关于国文教授改革的具体内容，据上海《时事新报》的报导：教授方面，“取研究的态度。以如人生最有关系的各种问题为纲，选择关于一问题的材料（都从杂志当中采取），印刷分送学生，使学生自己研究，教员随时指导，并和学生讨论。”作文方面，学生十分之九已作白话文。^⑧《星期评论》披露得更为详尽，听说该校国语教材以16个问题为纲，如人生、家族、贞操、文学等，以各杂志上关于各问题的文章做目，让学生用批评的眼光，去自动的研究。其教授法大纲，形式的目的，为使学生看懂用现代语（或近于现代语）发表于报刊的文章以及各学科教科书，并用现代语口说笔写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要自由、明白、普遍、迅速；实质的目的则是使学生了解人生真义和社会现象。^⑨

后来国语教授引发外界质疑，连蔡元培也觉得所编教材近乎伦理，不似文学。一师教职员的解释是，国语教授创始之际，最难的是没有现成的教材可用。方针既定，短期内只能草草地由国文教授会议暂定教授法大纲，选辑一百多篇国文教材，依纲分列，异说并存，叫学生用批评的眼光，取研究的方法。“当时以为近来的新出版物很多，里边的文字、主张是很庞杂的，与其听学生自由阅看，免不了有盲从的地方，何如把他整理一番，依着问题，归类起来，叫他们经过一番有系统的研究，不至于不明去取，有盲从底弊病。”恰好本校学生发表了一篇不成熟的文字，外界不明就里，以为是国语教材偏重思想的结果。“其实大家没有知道学生争看新出版物的狂热，新思想底灌输，非常利害，要遮拦也无从遮拦，要禁止也无从禁止呢！”国语教材的选编，固然很有缺陷，如太偏重内容的思想方面，未能顾及形式的法则的方面。^⑩所以蔡元培也觉得不大适合。而浙江一师的教职员对此颇有自觉，随时打算补救。

既然要了解人生真义和社会问题，又能表达思想，就不再仅仅是校园之内的教育问题，而成为社会性的文化问题。1919年9月16日，陈望道在该校国文课讲文学改革的道理，认为文字的本质是表达自己的意思，使人了解，所以要从容易的方面去，否则难以与人传递沟通。为此，文字不宜拘古，当应世界潮流。具体办法，一是改为白话文，二是标点，三是横行。^⑪1920

年1月21日上午的国文课讲胡适的《不朽》，学生陈范予了解的大意是，个人与社会世界有密切关系，一言一行、一善一恶，皆间接或直接受社会世界的影响或影响社会世界。但个人是“小我”，是要死的，永久存在的是“大我”，即社会世界，由无数“小我”组成。没有“大我”，一个个“小我”难以生存，所以要组成“大我”，谋社会世界的不朽。^③胡适的《不朽》意思甚多，特别挑出其中的“社会不朽论”加以阐发，显然目的不在文法表述等国语教育的范畴，甚至超出文白的形式之争，所要传达的主要是其中的思想性。这无疑会影响学生的观念行事。

一师的学生受了教育革新的影响，思想发生显著变化。陈范予最喜欢与同学辩论新学，觉得滋滋有味，乐不思归。“有这种研究的机会，正是促进新学的良机，其乐事也。”^④激发浙江一师风潮的突出事件，就是学生施存统所写、发表于《浙江新潮》上的《非孝》一文。尽管经亨颐辩驳说这是学生个人行为，《浙江新潮》并非浙江一师的刊物，而且他本人对文章的观点并不全都以为然，可是却成为冲突的导火索，在反对者和行政及教育当局看来，会连带导致废孔、公妻、共产等等问题，必须严查厉禁。

二、文化运动

教育革新的四项内容，看似并非文化运动。所以一师同学第一次请愿时，这样陈述事情的原委：“本校自去年暑假后，因为顺应世界潮流起见，曾有种种从根本上改革的措置，去尽宣传文化运动的责任，这亦不过是从本校地位和责任上发生出来的觉悟罢了。那（哪）里晓得，校内一切改革事项，还在试验期中，宣传文化运动的基础，没有建筑稳固；而社会上种种非议，无端四起，致耸厅长底听闻。”^⑤照此说来，一师仍然处于教育革新的试验初期，要为文化运动奠定基础，还没有真正进入文化运动的阶段。后来则解释为教育改革旨在“尽宣传文化之责任而已”^⑥。

相比之下，教职员的说法比较切合实际，他们认为，学科制尚未试办，职员专任，不过组织上的变更，对外界没有什么影响。只有学生自治和改授国语两件事，既是教育变更，又为本省学校中的创举，“所以和文化底进行，最有关系的，是这两件事情；最惹外界注目的，也就是这两件事情。”^⑦北京浙籍学界正告教育厅厅长夏敬观，也是挑出这两点来说：“自治为发展天能之良法，白话为传达思想之利器。”^⑧而无论学生自治还是改授国语，其实都已经得到民国政府教育部的认可，根本没有压制的理据。

不过，“文化运动，是人人都负责任的。但是文化发生的时候，因为时间空间上的关系，一定先有少数觉悟略早的人，宣传起出（来），等到立定了基础，方慢慢地发展到周围的各地去。现在本校底种种改革事业，不但是本校底关系，实在含有宣传文化的作用。经校长和同人等，并不敢自己硬充浙江文化运动上的先觉；但是觉得这种宣传文化的作用，是无从旁贷的，所以才下决心试行改革。”也就是说，一师是为了宣传文化而革新教育。改革的试验尚未成功，也没有改到健全的地步，浙江宣传文化的基础还没有立定，更没有发展到周围各地，所以经校长作为“本校改革事业底主动；也就是吾浙文化基础的中心”，决不能任其离校。^⑨由此看来，教育革新与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之事。也就是说，巩固我浙文化基础与维持本校改革精神是一事两面，或者说，文化运动是教育革新发生的作用，维持住教育革新，就巩固了文化基础。如果这一推断不错，就有必要论证教育革新与文化运动的关联，以求说明为何维持教育革新就能够进行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开展一年多后，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外延都不免有些茫然，思想和行动起来相当困惑。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苏甲荣主张将“文化运动”改称“教育扩张”，以求名实相副。其理据是：“我以为文化运动，其实就是教育扩张，若杂志之定期的与丛书之不定期的种种出版物，若平民教育演讲团，若平民夜校，那有一样不可以说是教育范围内的事呢？文化运动四个字容易令人偏想到杂志上去，而把其余较实际的事情丢了，所以我以为以后的文化运动不如用教育扩张四个字来替代他。”初民的时代，无所谓教育，只有生活上无意识的模仿与遗传，也无所谓文化。而有意识的选择即为教育。“教育之功用不外两个：消极的传授保存过去所汇集的经验，积极的利用过去的经验以创造新文明。文化是教育的产物，教育的目的，就在获得较高的文化。以质言，要使文化提高，须得把教育改善，增大他的能力；以量言，要使文化普及，须得把教育扩张，增多他的途径。”说到底，文化普及与教育扩张，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

针对胡适就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提高与普及的问题，苏甲荣认为：

现代德莫克拉西精神之德莫克拉西化，不但政治的权利要普及民众，所有艺术、科学、思想以及一切完善的组织制度也应该共同享有，文化不是阶级的，教育自然不能不扩张。

从前教育的责任在官与师，现在教育的责任在一切的人。……已受教育正受教育的尤其有教育未受教育者的责任。中国的青年，到“五四”后才觉悟他们这种的责任。

现在有一个很容易令人误会的争论：提高与普及。不是提高便可普及，也不是只管普及不必提高。提高是自身的事，普及宣传才是运动。文化是动的进步的向上的，虽然也有时停滞或退后起来，然从古到今，比较总是进步的，不是自今天起才说文化要提高；可是从前文化虽也一天一天的提高，然总是人类一部分的文化，智识阶级中的文化；普及乃是现代唯一的精神。若是不要普及，那么，就没有文化运动的可言。提高与普及是两件事，向上是文化的动性，不向上便不见得是文化。我们若是当那些把新名词从嘴里囫圇吞下，没有消化，又从肛门整个排泄出来，或是只从眼底经过指头钞过的作用，是真的文化运动，那么，文化自然不会向上；岂但不会向上，简直没有文化可言。所以我们不可不把文化运动认清，宣传附加的条件是了解，不是提高。了解什么便可以宣传什么，高是无限度的，要是说必提高才可以宣传，不知要高到那（哪）一点才可以宣传，而且提高与宣传也不是可以分离的，要是提高的不管宣传，宣传的又是另一部分人，那么，宣传永远都是那些囫圇吞下整个排泄出的作用了。

在苏甲荣看来，“过去的文化运动，差不多全都放在纸片上，最显著的就是定期出版的各种杂志，虽然后来也办了些平民讲演平民夜校，仍是占文化运动中极小的一部分。纸面的鼓吹（一）仍是限于智识阶级，不能普及民众，而且看出版物的，也只是倾向新的一部分人；（二）说了看了便算，只是知，未到行。现在大家对于这过于虚浮的出版事业早已厌倦，而且觉得把全副精神放在纸片上是很不经济。”一般教职员在学校的职务以外，“也应该拿出义务的精神去参加青年的文化运动，为他们的指导者。”通过办学校、讲演，“要使新文化的波动有如空气，视而不见，无孔不入。……从事文化运动者，不可无教徒传道的精神，还要比他诚恳而自然一点。”文化运动要想进一步推广，一是改善出版，一般性鼓吹社会改造和文化运动的只要最有价值的两三种，此外是特别注重一类问题或一种学问的专门杂志，如劳动、妇女、经济、新村、教育、文学、哲学、科学等。二是要有一种只求维持存在纯以文化运动为目的的书社经营。如果说以前文化运动是少数人的事业，以后就要人人出力。^①

新文化运动的这些特性，与经亨颐的教育理念相当合拍。与其说经亨颐是受了新思潮的影响，迎合新文化运动，不如说是经亨颐的教育革新刚好踩在了新文化运动的点上。一师学生说“经校长是我们浙江文化运动的先觉者”^②，之所以全力挽留，就是因为经去则浙省的教育革新与文化运动都将失去生机。不过，经亨颐的理念与新文化运动虽然大同，也不无小异，不能完全画等号。

经亨颐一生几乎都在办教育，所谓“教育者，根本之事业，基于今日而期于将来者也。”尤其是高等专门及大学，关乎地方文化，必须高度重视。民初中央临时教育会议规划高等教育分区，浙江未被列入，经亨颐担忧本省文化从此退步，希望仿大学办法，提升师范、医学、法政和其他专门学校的层级，并创办美术学校（含音乐），“所以增进文化，聚育人才”。同时重视社会教育，利用博物馆、图书馆、演艺馆、幻灯、写真、通俗讲演、公共运动场等设施，施自然之教育，以利导社会，开通民智。^③此外，还提倡教育与实业相结合。^④

在经亨颐看来，思想如空气，必须循环流通，“吾人欲生存于今日之地球，而谓必须吸五百年前之空气，必不可得。”顽固的思想如竹节，与时俗不相通。所以思想要每日更新，新旧不能分隔。^⑤他虽然年长，也自认为青年，可是对于“青年”二字之上，再加一个“新”字，却不以为然，因为“新青年”的对面就是“老顽固”。风潮之后他在上海遇到旧同事陈望道，后者说现在不敢与一般新青年讲话，许久不接触了，竟被新青年称为“新顽固”。经亨颐对此大为感触。陈望道可算提倡新文化很有成绩的人，可见一般激进青年的歧视。^⑥经亨颐的新旧循环论，与章士钊调和新旧的意思有些近似，而后的循环调和论被认为

是反对新文化。不过，经亨颐对南京高师教员刘伯明以基督教调和中国旧思想的主张不以为然，认为：“吾国近状且有新旧思想不和谐之大患，以哲学的研究宗教，余固愿惟以此调和不调和之思想，其效果如何，为大可研究之问题。”^⑦

就教育而论，经亨颐主张以人本主义为理念的人格教育。从19世纪的自然主义思想到20世纪的理想主义、人格主义，“自有理性淘汰之觉悟，二十世纪之思想遂大革新，且大发展；而教育之领域与职能，亦因而大扩充。人类之事业、人类之文明，非被动的自然淘汰之结果，而为自动的理性淘汰之结果。故人类之事业、人类之文明，皆人类自己负其责任。”

何谓人格？“盖人格者，各个人所以成社会之最要条件。”人格一方面为自立的、个人的，另一方面为协同的、社会的，相互实现，渐渐发展。人格实现，同时社会进于洽善。人格的实现为社会发达之本，无人格的社会，决非良好的社会。人类与人类相互进化的教育，即人格教育。^①

提倡人格教育，一些学生后来回忆说是与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分庭抗礼，对此经亨颐有所辩解，认为二者并不矛盾，尤其不能说是非此即彼。1917年3月7日的教育演习，学生朱寿朋与周其锺“以人格教育与职业教育，引起学理之争辩，而求余解决。”经亨颐声称：“夫职业为成立社会（之）要素，人格为维持社会之要件，二者不可离，过意偏执，实属多事。今日中国宜重人格教育，决无废除职业之意；若谓今日中国宜重职业教育，亦无人格已算完足之理。惟自社会全体观之，不能锡以二名称，则人格尚可包括职业，故余亦赞成人格之说。教育为治本之事业，不宜作治标之主张也。”并且特意注明：“人格教育与职业教育，决不可视为二问题，非性质异同问题，不过分量多少问题。唱人格教育者，非谓人类无须职业；唱职业教育者，亦非谓人格不足重。学者分为反对之二说，均属偏见。”^②不偏不倚并非二者并重，治本的人格教育包含了职业教育。

有些学生觉得经亨颐的人格教育是士大夫气重的表现。实则就思想根源而论，主要还是来自西洋。经亨颐认为职业教育源于与理想主义相对的实现主义，两种主义实为主从关系，理想主义已经容纳了实现派的精神。所以，他反对将教育局限于着重实效的职业教育，作为国家的教育方针，应该提倡人格教育。而且中国人有一种特别的精神，“毁之曰混沌，誉之曰神妙。图画、国文两种可为代表，最合人格教育之本旨。”^③

与人格教育相匹配，经亨颐还提倡自动教育。1919年1月27日午后，他前往教育厅，“为新正县视学会议讲演事，余认‘最新教育要义’，拟介绍‘动的教育法’与‘人格教育之说明’。”^④他在全省视学会议的讲演，题为《最新教育之三大主张》，取自日本及川平治所著《动的教育法》。^⑤2月3日，又从娱乐中悟到：“麻雀仅百数十张，一式尚如是之难，人民四万万之多，性质且有变更，而齐一教育之不能实现，与牌数难易相比比例，教育之动的见地，如求平符，视吾辈之手段熟练与经验，其理相同。”^⑥4月12日，在昌化视学，为县立高小学生演讲读书为人，“来学校不但读书，当学为人，及勤劳生活各要点。”^⑦也是动的教育应有之义。

动的教育内涵甚多，如不再强行整齐划一、增强学生动手能力、学校与社会多接触等，而与新文化运动的合拍，集中体现于教授方式的自动和学生管理的自治。到新文化运动发生之际，中国的教学方式主要有传统的记诵式，晚清源自日本（以德国为本）的灌输式，民初的启发式以及正在倡行中的自动式。前者是死记硬背，开始完全不懂意思，久而久之，熟能生巧，对于后来治学，童子功尤为重要。灌输式则是以教科书或讲义为准，将所包含知识尽可能充分地注入学生的脑海心中，却并不考虑这些知识是否如实完整，以及如何转化为学生学习的凭借。启发式要在教师主导，与学生互动。自动式则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从旁辅助。

近代学堂推行西式教育，最初模仿的对象却是东洋，而日本的教育源自德国模式，以灌输式或注入式为主。民元美国的哈佛校长东来，造访香港、广州、上海、天津、北京及满洲等地，“盛讥日本式教育之未善。维时同人微有所省悟，亟欲探讨欧美教育。”懂西文的俞子夷研究最勤，并与友人试学于苏州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时论颇议其放纵。民国二年，美孟罗博士来观，独大激赏，诧为仅见。越二年，郭君秉文、陈君主素留学毕，俞君偕之考察欧美教育而归，一时新教育之援师大集，精神为之一振。同人所知者，教育在发展个性，于是怨乎划一教育、严肃教育而唱自动主义。学校宜注重生活，与社会联络，于是怨乎

书本教育、虚名教育而唱实用主义。顾三五年来，口头笔底所窥见一鳞一爪之新教育，今得杜威博士来为探本穷源之指导，于是吾人之知识渐归于系统，而措之行事，亦觉有条理可寻而无所惑矣。”这不仅是近代中国教育史的一大关节，也是理解德先生意涵的重要取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来华的杜威，演讲的主题之一，就是教育的自动与自治。一直关注此事的黄炎培说：“杜威氏之来华，实予吾人以实施新教育最亲切之兴味与最伟大之助力。”

来华期间，杜威先后在中国南北各地连续举行多次演讲，为了了解听众对于杜威主张的感想，黄炎培跟随其行程对听众进行查访，其中有四种怀疑意见：甲、自动主义甚善，但我国教育程度不够。乙、东西方国情不同，能否完全仿行。丙、中国社会程度幼稚，骤行其说，或造成教育障碍。丁、其说可行，但难得深明其原理的教员。黄炎培一一有所解释，认为“杜威所倡平民教育主义，在揭橥共和，而教育缺乏之国家，实更有提倡之必要。”

正当欢喜赞叹杜威主张者“竞谋所以实施”之时，五四“学潮事发，全国视线集中于一般青年之动作与时事之变化，此问题遂搁置。乃者学潮过去，全国教育家咸亟亟焉谋所以善后”^①。杜威所说教育的自动主义，与新文化运动的德先生关系极大。1919年5月7日，浙江一师学生陈范予到省教育会听杜威演讲，“今者咸云德国教育有取法者，日本教育有效规者，诿须知教育之施行大有关于国体，德、日专制，故教育施行犹如各物置进杯中，令人人脑中有信的向。民主教育则反之，如杯中之物，欲咸泄扬于外，令人人得知。德、日之教育以形，必不能长久，民主之教育以精神，故能久持而不衰。凡研究教育者不得不从精神上着手。儿童之养成最要为自动之能力，施教者当深谙儿童性情，力察儿童之短长，短者当思所以淘汰之，长者当发展之，奇者养成之，然后将各有之才于无为之行动自鲜矣。各方面自动之能力尤当极力提发。”^②所谓民主教育，即自动主义教育的同义表述。

自动教育必须与学生自治相配合，才能养成高尚人格。民主与科学后来被指为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核心要素，而这时的德先生主要不是指政治民主，尤其不是专指代议制民主。1919年的中国乃至世界，由于国会的乱象以及欧战的刺激，代议制民主声名狼藉，原来大力鼓吹宪政议会的汤化龙、梁启超、张君勱等人，纷纷宣称代议制破产过时，而希望用直接民权予以替代或补救。对于军阀政客把持的政权，有心之士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不做官参政，成为重要的时代风尚和道德准则。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德先生的认识和追求，主要不是体现于政治制度上，而是全社会的自由、平等、互助。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启修指“democracy”有民众主义、民权主义、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平民主义、唯民主义、民治主义、庶民主义等八种译法，而以庶民主义为最准确，其主要依据就是不偏于政治。^③李大钊也认为民本、民治、民主等，虽各有高下当否之别，都偏于政治，不能在经济、艺术、文学及其他社会生活方面恰当表现原意。虽然他认为平民主义、唯民主义、国民主义等译名较为妥当，还是觉得音译德莫克拉西损失原意较少。^④

由此可见，“democracy”使用音译，一方面是由于其本意较为复杂，汉语中很难找到普遍认可且意思吻合的统一对应名词，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当时国人的民主追求正从政治扩展到社会各方面，甚至有远离政权的趋向。教育领域尤其如此。1919年4月，浙江教育会的沈仲九就在《教育潮》第1卷第1期发表了《德莫克拉西的教育》一文。陈范予所说的“民主教育”，其实就是教育自动和学生自治的合体。

杜威的主张及其来华演讲，刚好契合了中国人的需求。与白弼德的精英主义教育主张不同，杜威的教育主张是平民主义，尤其强调受教育者的自治。所谓德莫克拉西的教育，主要就是自动式教育。在杜威演讲的推动下，《教育潮》《新教育》等刊物推出专刊专栏，重点讨论教育的德莫克拉西问题。而教育的德莫克拉西，既是教育本身的需求，也是培养国民素质的需要。所以黄炎培说在教育缺乏的共和体制国度，更有提倡杜威平民教育的必要。其时想改造中国的有志之士大都认为，直接改革政治只会造成政坛走马灯，必须改革社会才能奠定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而教育的作用至关重要，自动教育和学生自治，正是德先生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其实自动教育已经不是全新思想，早在1915年3月6日，就读于浙江一师二年级的杨贤江就在该校校友会言论部演讲过“学生自动之必要及其事业”，认为学生在教育上虽然居被动地位，但“教授之力，仅为诱导之具，而自动之力，实为成功之基。仅

有智识而不发展其能力，则所得终难见诸实行。”“自动者，而以自己之能力而为活动者也，即自能之事而自为之者也。”其说看似仅仅作为教育的补充，而且偏重自治一面，其实也包括教育的自动。因为世界教育的趋势在于注重生徒自动的方面，小学教育也主张自动主义和自学辅导，以发展其自动之能力。中学毕业生投身社会，“大都触处窒碍，枘凿不入”，“教育不重自动，实为弊病之大者。”因此，必须厉行自动主义，事事自动，养成他日任事的能力和处应社会的手腕。学生在校，当自行组织团体，互相指导纠正，养成公共善良之习惯和独立生活之精神。在个人方面，自修、勤劳、作日记笔记及账簿，在团体方面，则是集会。^①

在接受自动主义教育理念的同时，经亨颐对于主张者过于偏激也有所不满，希望予以纠正。1919年4月3日，他“随想《动的教育者之标准》为演题，本动的模范之意，以解释新教育。近来美国派之思想亦趋逢过甚，窃有所感焉！”^②

与人格教育、动的教育相关联，经亨颐又主张英才教育。他认为学校不但教育学生，尤当教育社会。就近如开放运动场，设通俗展览会及讲习会，责成校长和专任教员主持办理，指导学生养成服务社会的观念。致远则刊行学校杂志，以灌输思想学术为主旨，学校程度虽然有别，同为教育研究家所居之地，都要担负促进社会文化的职责。^③为此，经亨颐热衷于办青年团的创举，并创办了《青年团》五日刊，还亲自撰写了一篇《青年之观念》付刊。“因无意谈话中闻得某君‘我们不是青年了’一语有所感：自悲非青年，自诩非青年。我们都是青年，易自悲为自警，易自诩为自勉也可。”^④

经亨颐的文化运动，显然并非局限于校园之内的教育，而他教育青年学生，是希望培养学生去教育社会。1919年2月26日午后，他在浙江教育会举行的讲习会上，为各县视学讲演“最新教育要义，于预备原稿以外，又有演绎，直讲至四时”^⑤。3月2日下午3时，到浙江教育会由厅集县视学所开茶话会演说“出版之需要，精神穷乏，脑子饥饿，为吾国根本之缺点。嗣又提议实施义务教育研究会事”^⑥。3月4日，在校友会大会致辞，“大致谓人生贵有一定之事业，而今后社会诸事业，恐一定者少，不定者多，国人以不定之精神，候一定之事业，致有高等游民现状。若以一定之精神，任不定之事业，限制职务以外，大有可为，干事之练习较前尤为切要也。”^⑦3月6日午后，在校务研究会上提议编时事周刊，张贴揭示，学生可省阅报工夫。^⑧3月13日，为教育会劝学所纪念书联语二副：“辅导青年，发展人格”；“理性有差别，教育尚机能。”^⑨

教育革新在校内开始引发分歧乃至冲突。国语教授开展前的1919年4月30日，“本校学生文课有白话，而子韶大不为然，盛气而辞。北京大学之暗潮次及吾浙，亦本校之光也。惟为友谊，亦不得不慰劝，志不可夺，未便相强。下学期国文教授有革新之望，须及早物色相当者任之。余囑意沈仲九或张瞻，未知能否如愿也！”^⑩改革后争议扩大到学生层面。1920年1月28日，陈范予和同学亲友谈时势，得到的回应不一，有的认为“白话断无废去之理”，而担任小学校长的亲戚反驳道：“肚中没有根底，弄这种无为的白话，弄到后来，弄得一句不通！算是什么东西！”震得陈范予面红耳热，一言难对。恨自己的确没有根底，只能三缄其口，无法劝告，救他到光明路上来，并且担忧其所教子弟如何成才。^①

清季民初，学界风潮此起彼伏，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主持教育者的态度，与学生有所分别。五四运动期间，经亨颐也有些左右为难。1919年5月23日下午4时，他召集各校学生代表谈话：“学生联合会之勇气，拟导入轨道。余意学生示威运动究为有限之效力，非达到市民与一般社会接（结）合不可。”^②5月27日又自我反省：“余所处地位，新旧交攻，众矢之的。收放则可，而志不可夺，自今日韬光行事。”^③5月28日，经亨颐集合一师全体学生临时训话：“爱国与祸国不可分，适可而止，留以有待。”^④

对于中国的现状，经亨颐无疑相当不满。他认为，中国办学数十年，因循敷衍，全无理想，以教育为生计之方便，以学校为栖身之传舍，所谓文化，所谓社会，所谓人格，本不置于心目。既然教育是改造文化、增进文化的精神事业，“当以维持文化、传达文化为己任。……不但维持文化，尤当改造文化；不但传达文化，尤须增进文化。”而改造与增进文化，必自文字始。^⑤

不过经亨颐虽然赞成吸收他国之长补我国不足，同时又担忧将我国的所长、特色，任其沦亡而不顾，主张国家有人格，不赞成留学生“归自某国者必欲将祖国造成某该国，绝对的以某该国为模型，事事无不以某该国为前提。”他认为中国的新人格是

团体精神加个人发展，与西洋的个人发展加团体精神有别。所以我国人格的要件在“仍旧增新”四字，调和“去旧生新”与“仇新守旧”相反对的心理。在他看来，中国的新人格即我国旧有的团体精神加西洋旧有的个人主义。⑥这与一味趋新西化者的理念明显有别。

浙江一师的全体同学在第一次宣言时就说：五四、六三运动激励起来的时代精神，风起云涌地弥漫全国，稍有知识判断的人都迎接新潮流和新思想，也有许多人理解不喜欢，甚至抗拒。“本校经校长却就本了平素的主张，明白迎接这新的潮流和思想的应该和必要，就本校的组织上，教授上，管理训练上，大大地改革了一番，去适合教育革新的趋势，去顺应那世界的潮流。”⑦所以陈范予听闻经亨颐辞职的噩耗，“真令我发指目裂，大受凄惨，遽减我求学之乐！然只有尽力奋斗，尽力牺牲，与教育当局决一死战而后已。”⑧

三、誓为教育改革和文化运动牺牲

一师同学将当局的压制定性为泯灭教育改革和蹂躏文化运动，表示“誓为教育改革和文化运动牺牲”⑨。在新文化运动中，如此旗帜鲜明地与当局针锋相对，浙江一师风潮堪称独一无二。

一师学生对于自己担负新文化运动的责任高度自觉，他们第一次请愿宣言就明确宣称：

新文化运动，本来不一定是一部分人所能宣传的。但是一社会当中，因为另一部分受了旧社会环境关系，思想上锢蔽太深，不易改迁，所以宣传新文化，不能不把自己的基础，建筑巩固起来，然后再以刚毅坚决的精神，渐渐发舒扩大出去，方有成功的希望。学生等都是为研究教育而来，宣传新文化事业，和教育者自身方面有密切关系，那（哪）里可以不负一点责任？所以因为觉悟到自己责任方面，虽于宣传方法上不免有些訾议，容易惹人误会，但从良心上讲，终以为必须如此做去，方不负教育者的责任。本校为师范学校，在地位上，责任上，更比别人别校还要重得多。所以本校自去年秋季以来，种种革新事业，都和传播文化有关系。+10

夏敬观说要知文化运动，须学问最深之人，先为有系统之提倡，然后影响于一般社会，始少流弊而多实效。若今日中等学校学生，研究未深，何能骤语及此？而一师的学生不以为然：“吾辈中等学生，固不敢自鸣其学之深而且粹也！特以‘文化运动’四字，终觉人人应该负宣传之责，断非少数贵族式之学问家，所能专责传播；亦断非少数贵族式学问家传播，始影响于一般社会人之心，且免其无丝毫之流弊也。”⑩

尽管一师风潮一开始就将重点集中于校长经亨颐的去留，却始终认定不是欢迎谁反对谁的问题，而是拯救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也就是说，挽留经亨颐，并非其个人的去就，而是关乎浙江教育革新与文化运动的兴衰成败。一师同学的自认，得到杭州学界的公认，杭州学生联合会请愿宣言称：“近者第一师校校长经亨颐，倡言教育革新，主持文化运动。”所要求事项的第一点关于浙江全省者，就是维持文化运动；⑪该会的请愿省长书则称：经校长“为教育改革之主持人”，“吾浙文化运动之先觉者”。经去，文化运动失此维护指导者。而浙江教育与中国文化有莫大关系。⑫一师学生致电上海学生联合会，表示省长齐耀珊和教育厅长夏敬观摧残吾浙文化。我等誓为文化运动作先驱之牺牲。⑬

浙江学生经由上海各报馆转各地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浙江同乡会及各团体各报馆的公电赞同这样的认定：“欧战告终，时代革新。吾人欲免自然淘汰于人类之中，自不能不事顺应而谋适合，教育为沟通本能与社会之工具，岂有墨守旧法之理。吾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洞见及此，自去秋以后，提倡新文化运动，改革该校之设施。凡诸办理，皆与新潮流相适应。智者群认为吾浙教育之大革新。”⑭

绍兴学生通电全国诸同学，不仅认定“浙江第一师校为倡导新文化的先锋”，现在被迫休业解散，使得方才萌芽、生机勃勃、大家寄予希望的新文化不幸遭受黑暗势力的摧残，夭折了一个文化运动的同志，而且宣称：“一师因倡导新文化的缘故，遭官厅

摧残，这就是官厅和新文化宣战的一种表示。推测其意，非把新文化根本打倒不可。那么，倡导新文化的学校，不只一师一个，而且凡是学校都应该倡导新文化的，不过倡导的程度、分量和时间上有点差异。现在勒令一师休业，只算是一个发端，其余的恐也要一个个拿来如法炮制呢！”为此，承认新文化，而且表同情于一师的浙江学生，为保存浙江新文化起见，要实现所倡导新文化的理想，除积极的继续进行外，还要对摧残文化的当局要求：（一）撤换夏敬观；（二）恢复第一师校教育原状；（三）第一师校校长的资格，非有教育上高深之研究，对于新文化能热心倡导，而有成绩可考者充当不可。摧残新文化运动等于摧残新文化，也等于摧残愿意做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全浙学生，若坐视不顾，不仅自己没人格，简直是不承认新文化的表示，不配受教育甚至做人，呼吁志同道合的广大学生快快起来，“大家结一个大团体，本着良心和黑暗势力奋斗，要一致牺牲在新文化上面！”^⑥

各地各界接受了浙江学生的说法，在上海的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致函夏敬观，表示：“去岁以来，国内谈新教育者纷起，自‘五四’而后，新文化运动之声洋洋盈耳。经子渊先生以浙省教育会会长之资格，提倡新思潮，不遗余力，全浙学界，始勃然有生气。经先生以为徒托空谈，犹不足以济事，于是以彼所主持之第一师范为新学说实验之地。”^⑦

《上海学生联合会日记》以《新文化运动的真牺牲者》为题评论道：现在大家高唱文化运动，“可是要讲到真正为新文化运动而牺牲，不得不推已被解散的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为首屈一指。”各地如京津鲁闽湘鄂的学生也有牺牲，不过是为救国运动，如抵制日货，要求驳回通牒之类，“还说不因文化上的革新运动而牺牲。”上一年北京大学学生为蔡校长的辞职，似有为新文化运动而牺牲的趋势，因得到全国学界的赞助，把蔡请了回去，新文化的出版物更多更精。“可见得全国的学生，从严格讲，实在没有过为新文化的革新运动而真正牺牲，有之，自浙江一师学生始！”^⑧

与冲突发生后各方一致拥戴经亨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有别，1919年11月经亨颐在与教育厅查办员谈话时说过一段比较有分寸的话，他说：校长教员对于本校应当负责任，却不能负完全责任，因为学生受校长、教员的教训，但不能禁止他不受学校以外的教训。“近来新思潮这样渤（勃）发，新出版物这样的多，感动的力量实在大得了不得。差不多到处都是比我们着重要有力的校长教员，要想法子禁止，实在是办不到的。我有一个比方，空气能够排得尽，新思潮才能够禁止。”^⑨此言并非推托之词。

经此一役，经亨颐深知无由重返一师，在给一师学生的复函中，他自比黑暗家庭里三代尊亲晚婆压力下的媳妇，还有许多三姑六婆搬弄是非，本来他“稍稍地要想买些新物事给你们吃，不小心被他们拾了果子底皮和壳——《非孝》。”而学生们太心急，“信煞‘言行一致’”，件件事立刻要实现，不免惹起一般社会和家族的恐慌。“寒假以前，我曾经和你们说过：要讲文化运动，教育者底态度和他们记者底态度是有分别的，不可全凭主观，也要顾到客观。曾相约课后好好地想个脚踏实地的方法，何必引起外界的误会，反而不能达到我们底目的！你们也很领悟的。”并劝学生：“无论要做什么事，切不可拘执一种办法，对象和环境变到怎样，就应该随时酌量。”^⑩

该校学生梁柏台说，浙江一师受人攻击，以致“四面楚歌”“众矢之的”，主因是提倡新潮流。要改造社会，免不得受人攻击，不经人家为难，总没有进步的地方。“敝校得有今日的轰轰烈烈者，‘书报贩卖部’的功劳也很多。自从‘书报贩卖部’设立以来，报纸、杂志到几十种的（之）多，每种要销一百几十份，每人所看的杂志，总在三四种以上。九年一月，敝校还有一种报纸产生出世了，名字叫做《钱江评论》。”^⑪北京《晨报》对于浙江一师少数有觉悟的学生组织的“书报贩卖部”，也以“杭州特约通信”的名义有所报道，称其“专门贩卖新出版底‘新杂志’，如《思潮》《新潮》《北京大学月刊》《新青年》《解放与改造》……一类底‘新思想’‘新文艺’底书报，不知不觉把那‘妇女解放’‘劳工神圣’‘国民自决’……一派底‘新运动’介绍到了杭州。一班学校里底青年多半受了这种势力底感动，就是老先生们反对的固然不少，即赞成的也大有其人，所以我们杭州这里虽然算不了‘文化运动’底‘开疆辟土’底功臣，也算‘文化运动’底‘殖民地’了。”^⑫

上海《时事新报》了解得更加深入详尽：“该校书报贩卖部，是由少数学生自由组织的。这个贩卖部，对于该校，可说是有很大的效力。该校改革的动机，大半由于学生的自觉。学生自觉的原因，都由于新出版物的购阅，而供给新出版物的机关，就

是书报贩卖部。听说该部现在书报的销路，计《星期评论》180分，《教育潮》120分，《民国周刊》120分，《建设》35分，《少年中国》50分，《新青年》50分，《新潮》80分，《解放与改造》80分，《平民教育》90分，《曙光》20分，《星期日》30分，该校学生欢迎新出版物的情形，也可以想见了。”^⑥施复亮（存统）回忆，一师的书报贩卖部每天到西湖边公众体育场贩卖各种进步书刊，传播新思潮的刊物有十几种，销行最广的是《新青年》和《星期评论》。一师学生约四百人，有个时期校内就销行《新青年》和《星期评论》四百几十份。^⑦

陈范予的日记可以部分印证上述说法，其1920年1月4日日记：“我自堕地到现在，都是昏昏董董，在梦昧里谋生活；什么人生观，都是莫明其妙。到去年下半年，受了国家的新文化运动、世界的大潮流冲动，刚才发出一线光明；知道我个人这样？我对社会这样？对国家这样？已经摸着一点头引子，找出一点小光明了！”只是自觉学识不够，不能彻底看到世界究竟怎样，而文化日进，日月时老，有时不我待之感，于是自立关于自身和国家的希望表，前者要由无系统目的的随便学，改为有系统目的的紧着学。要有人生观，将肉欲改为精神之欲，养成自由心，博爱心，多在社会服务，时时做劳工事业。后者则由军阀、权势、偏废，变为自由、平等、普遍，打破资本主义，实行劳工生活，推翻阶级的教育，实施平民的教育，抱着博爱，互助同胞，工读互助日兴一日，普满全国，成为苦学生的栽培所，铸成英才。^①

是年初，浙江教育界因是否支持北京教员罢课而导致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分歧，一师的学生会坚持以行动声援北京教员，各校代表赞许道：“这次的奋斗是光明与黑暗争斗，新思潮与老顽固交战，今者第一师范随新潮之趋势，做二十世纪的事业。”而各校因为顽固势盛，不能一致。“我们今已觉悟，决向光明路上走，做一个二十世纪的人，做新思潮的人，和第一师范同学一样！”陈范予不禁欣然，“这也是黑暗中的一颗明星呢！”^②

刊登《非孝》一文的《浙江新潮》周刊，是杭州各校一些志同道合的学生自动组织的刊物，原名《双十》，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一方面竭力把‘新思潮’传布，一方面对于守旧派立于指导者的地位，下一种诚恳的劝告，使他们渐渐的新陈代谢。诸位旧思想的末日到了，人类解放期就在目前了，假使再不趁此吸收些‘新’的学识，那么现在二十世纪上就要天演淘汰了。”^③

《双十》改名应该是模仿北京大学学生的《新潮》，内容却有所分别。所要解决的宇宙将来、人生鹄的、真理标准三大问题，而以“生活”“幸福”“进化”为对应，并认为是现代一切思潮的根本。该刊旨趣有四，其一，确定以“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化”为宗旨。其二，欲达此目的，必备三项条件，即自由、互助、劳动。目前达不到，是因为有种种束缚、竞争和掠夺，如风俗、习惯、宗教、法律的主张，政治、经济的制度，家族、国家的组织。“我们要谋‘生活的幸福和进步’，不可不破坏束缚、竞争、掠夺的东西，建设自由的、互助的、劳动的社会。这建设和破坏，就是改造社会。”所以周刊以改造社会为目的。其三，改造社会的责任在于农工劳动者，改造的方法在于“自觉”和“联合”。人类大致分为政治、资本、智识、劳动四种阶级，前三种基本是束缚、竞争和掠夺，只有劳动阶级可以担负改造的责任。觉悟的智识分子应投身劳动界，自觉的方法为学校、讲演、出版等教育事业，联合的方法是由小团体而成大团体，“能自觉才能联合，能联合才能破坏，才能建设。自觉和联合是改造的唯一方法。”促进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为周刊的方针。其四，中国的劳动者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不能靠文字促使其自觉与联合。青年学生是中国很有希望的平民，教育劳动者是他们最重要的责任。“本报一方面直接负促进劳动者的责任，一方面又当鼓吹学生担任教育劳动者的职任。我们的希望，第一步当以学生的自觉和联合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第二步当使学生界和劳动界联合；第三步当使学生都为劳动者，谋劳动界的大联合。等到学生都投身劳动界，那么改造的目的就容易达到了。”促进的方法，是从调查、批评、指导入手。^④

就《发刊词》标明的主张而论，《浙江新潮》同仁的认识已经超越五四运动前《新青年》《新潮》等坚持的思想启蒙阶段，进入新文化运动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改造阶段，甚至超越少年中国学会的主张，将社会革命以及政治革命纳入目标范围，并且以劳动界的大联合为路径，与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新青年》相当接近。

《浙江新潮》的宗旨主张，显然不是经亨颐的理念所能范围。不仅如此，该刊还明确反对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谋一部分人类的发展，以助全人类的发展。”^⑤此说未必针对当时包括少年中国学会部分会员在内的思想倾向，却与坚持国家主义的经亨

颇大异其趣。尽管各自的国家主义内涵及其针对可能大不一样。

浙江一师风潮过去，同学将相关的文件报道编成《浙潮第一声》的册子，说到经亨颐去职的原因，特别指出，一般的观察都说是“新旧冲突”，其实不然。“倒经”的人以“旧”做幌子，并不明了所谓新旧。真实的原因有三，一是杭州教育界的同行嫉妒，二是浙江省议会的报仇主义（经反对议员加薪），三是浙江官厅的傀儡生涯。^①

风潮发生前后，外界对浙江文化运动的看法有些微妙的变化。之前上海《时事新报》说：“浙江省会（杭州）现在居然也有‘文化运动’了，那宣传最力的，就是省教育会出版的《教育潮》。虽则是一个机关的出版物，但是编辑的仲九，能够脱尽外界的羁束，竭力的宣传文化，提倡革新事业。他们所主张的教育方针，介绍的新学说，都是狠合着现代思潮的。那未来的‘教育革命’，他们必定是先趋（驱）。”由青年团出版的《青年五日刊》也很有价值，后改组为《青年周刊》，也由沈仲九编辑，内容更有魄力。可惜受青年团董事的干涉，只出了一期就停刊。第一中学和工业学校学生合办的《双十》半月刊，也是顺应新潮流的。第一师范师生的《校友会十日刊》，介绍新思潮而偏重于教育方面，但凡是与教育有关的，如人生、社会、道德等，一概容纳，所以和《双十》一起，“可算是杭州学生界破天荒的出版物了”^②。

北京《晨报》则称《教育潮》看见文化运动只注重教育不易成功，第一步还是“思想底解放和改造”，所以对思想方面也郑重介绍和批评，作为一省教育的总机关，“真不愧为我们浙江‘文化运动’底大本营”。^③这是将浙江教育会视为文化运动的中枢。《申报》则称：“浙江第一师校对于新文化运动，素极注意，以全浙而论，可称文化运动之先锋队。”^④

大本营和先锋队的说法，大概描绘了浙江新文化运动的情景。浙江文化运动的中枢，“以教育界言，是在浙江省教育会，他出一种《教育潮》的杂志，就是鼓吹新教育和新文化的。以学生界言，就是在浙江第一师范了。他们并且是有联带的关系，因为经亨颐先生一方面是省教育会的会长，一方面又是第一师范的校长；所以经先生的宗旨，就是要把省教育会做理论上提倡新文化的机关，把第一师范做事实上试验新教育的机关”。^⑤五四以后，北大和全国学生一齐奋斗，才挽救了撤换蔡校长的危机。现在一师为新文化运动而牺牲，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各省学生，不能袖手旁观。

经亨颐一身二任，坐镇大本营，指挥先锋队，作势要长期开展新文化运动。风潮中当局矛头指向经校长而不及经会长，学生和主编《教育潮》的沈仲九等人索性将教育革新与文化运动的旗帜统统归于第一师范，以掩护经会长脱身。

维系文化运动当然不能牺牲教育革新，但毕竟前者更具前瞻性。上海《民国日报》署名“际安”的《浙江学潮事告各界》，不仅指出一师学潮的与众不同，而且点到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分际。在作者看来，各处军警蹂躏学界半年中不止十数次，“只有浙江一师的学潮，是为新文化运动而牺牲的。对付外交是图目前的补救，新文化运动是树将来的基础。要建造新中国，非由新文化运动入手不可，所以这回浙江学潮，比较的尤为重要”，呼吁各界赶快一致奋起，做浙江学生的后盾。^⑥此说独具慧眼，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使命，正是为将来奠基。

正因为此，当事人和旁观者大都重视经亨颐的提倡文化，改革教育，认为一师风潮“实为我国文化前途发展的大问题”。国人从前对于文化渺不关心，民国以后关于学术的书报杂志，出版极少，无人过问。“幸而自去年文化运动发生以后，国人沉眠不醒的脑根大为觉悟，遂起一种智识的饥渴，因而新出版物日日增加。”文化为民族荣枯所系，文化不进，民智不能与他民族平等，其他待遇也不能平等，失却所以为人类的要件。“所以文化宣传，乃人类上一种神圣事业，不容他人拦阻的”。教育为文化枢机，浙省地方官对一师的处置，实在可以说是与文化宣战。^①

五四运动高潮过后，国民党和江苏教育会（蒋梦麟其实仍然属于江苏教育会）遥相呼应发起新文化运动，主要的政治目的是阻止控制民国中央政权的安福系向南方扩张势力，并进而设法收复在北方的失地，如北京大学。由于直接的政治运动不易奏效，所以由文化运动造成新的文化事业和社会事业，从而奠定政治变革的社会基础。处于革命上升期的国民党从一开始就对浙江一师风潮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斥责当局的压制。据说对于一师风潮，上海各报中，《申报》《民国日报》最起劲，记载最为

详尽，且评论有力。②认真考察，《民国日报》是有立场的支持，而且与国民党的其他报刊如《星期评论》《建设》等，口径、步调一致。此外态度比较鲜明的是《时事新报》，该报名义上属于梁启超的研究系，实际控制者却是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浙江海盐人）。戊戌政坛失足后，张元济虽然声称绝足官场，却有意识地暗中借助传媒掌控舆论，影响政局，从辛亥到五四，成为左右中国政治情势有力的无形之手。③

参与主编《星期评论》的沈定一（玄庐）是浙江萧山人。他特意专门写了《学生与文化运动》一文，支持并鼓励学生进一步奋争：“浙江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受着打击了。新文化运动的敌人，撑出他枯朽的铁臂膊，一拳打去了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新文化倡导者的校长经亨颐。”因为《浙江新潮》刊登《非孝》，“这一种文章是新文化运动的表现。浙江的官吏，既做了新文化运动的敌人，就不能不找着一个先导者的第一师范给他一个打击。去经亨颐的校长，就是表示他们打击新文化第一声的权威。”经是省视学，不会倒，一师也不会倒，“真正受着打击的，就是第一师范有了新文化思想的学生。”一师学生不会从此停止新文化运动，“即使全浙江学校里面的新文化运动算是凌灭罄尽，浙江以外，还是有新文化运动的；即使北军阀势力范围底下各行省，都被蹂躏平了，西南半壁，一样有新文化运动的立场。即使南北军阀同盟和新文化宣战，……空气流到得了的地方，就是新文化运动得起的地方。新文化初起时就受着打击，便是新文化的本能。权威啊！我必有一天看得到你投降在新文化旗帜底下的日子。”“我们青年学生不为那一个人负的责任，为新文化负的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的生命，我们为生命负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的将来，我们为将来负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前途的光明，我们为光明负责任。新文化的敌人，已经对于我们青年的生命，将来的生命，光明的生命宣了战了！我们要试验我们生命的力量，正是这个机会。”④

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正在向着新型革命政党发生蜕变。鼓动新文化运动，除了打倒当前的强敌安福系，也在考虑如何改变中国的社会基础，从而结束辛亥以来政局的乱象。一些国民党人参与共产主义小组乃至中共建党的活动，就反映了这样的动向。五四运动以惩办三国贼和钱能训内阁倒台为结果，推翻段祺瑞和安福系的目的未能达成，安福系反而趁机向南方尤其是东南一带扩展势力，引起国民党和江苏教育会的高度警惕。经亨颐记，1919年6月13日下午，“赓三、肃文、仲九等来谈，因闻安福系有谋教育会之举，共筹对付。本届大会，竞争必更剧也。吁！政党注意及此，乱我清静教育界，可恨！”⑤浙江一师风潮发生，反抗的矛头也对准安福系，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致函浙江教育厅厅长夏敬观，指其“受安福私党之成命，抱摧残教育之决心”，“处心积虑以与新文化为敌”⑥。其间一度被任命为代校长的金布另聘职教员，据说“半系安福分子，志在摧残该校从前之文化运动，而尽将学生收入彼系。盖金布虽为该校毕业生，但与官僚相亲日久，已卖久安福鱼行”⑦。

相比之下，江苏教育会的态度不够旗帜鲜明。江浙两省地近人同，晚清以来，在许多重大事情上常常携手联合，共同进退，而江苏教育会实力更强，且有全局性的大计划，在其中往往起主导作用。清季民初，江苏教育会掌控全国教育界，浙江人则掌控民国政府教育部，双方相互配合，合作无间。蔡元培虽是浙江人，却与江苏教育会关系极深。有此渊源，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江苏教育会对于邻省因文化运动而发生的风潮，理应更加关注。只是黄炎培与经亨颐之间，因为教育主张不同，暗中的确较劲，难免心生芥蒂。浙江教育会长期靠经亨颐独立支撑，虽曾向江苏教育会求援，可是担任副会长的黄炎培却不肯伸出援手。此番风潮，国民党推波助澜，江苏教育会却似乎冷眼旁观，无所表示。

风潮结束后，一师教育革新的成果得以保存和延续，国文继续讲胡适的文学的国语、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之类，历史则讲人类社会，不是英雄豪杰的寡头历史。连英文翻译课也讲今后中国的光明，有危险，有机会，要改进社会。博物课讲蚕的种类，引申到蚕丝为中国一大出产，近来因为不讲究，所以不能占世界第一的位置，此后应格外注意。又请杜威来校连续演讲，题目包括“Democracy 真义”（在青年会讲）、“De-mocracy 的社会分子应有的性质”“教育从什么做起”“科学与人生”等。学生们听罢，一方面深受启发，一方面也不无疑问。如杜威说今日中国国民程度还不能讲共产等问题，只能像西洋百年前的改造社会研究科学，才不至受洪水泛滥，不得一衣之暖、一时之饱之祸。陈范予不满意其说，质疑照此看来，岂不中国跟不上做二十世纪之一国吗？①而新任校长的为人行事，同样并不令人满意。②学科制则仍在讲解之中。对于南北各处军阀混战，饥民遍地，民不聊生，陈范予痛心疾首，希望民众早日觉醒，发动革命。思想的解放与现实的残酷，反差过大，激愤的同时，也有些无奈。这样的情形，使得不少一师学生相继走上革命的道路，寻求变理想为现实的大道。

〔作者桑兵，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杭州 310058〕